

论 21 世纪以来津巴布韦文学中的 民族对立与国家认同*

蓝云春

【内容提要】 非洲国家普遍面临国内民族对立与国家认同较弱的问题, 文学作品是记录与传递民族心声的重要形式。本文以 21 世纪以来, 津巴布韦的恩德贝莱族与绍纳族两大族群英语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 从文学题材的选取、主题偏好、叙事基调与审美情趣等方面, 分析比较两大族群作家群体在国家认同方面的差异, 以及彼此间民族对立的焦点和表现。

【关键词】 津巴布韦英语文学; 厌乱主题; 民族对立; 国家认同

【作者简介】 蓝云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杭州, 310018)。

在世界喜迎千禧之际, 2000 年却是津巴布韦噩梦的开端。这一年发生了多起对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重大的事件, “具有历史转折意义”。^① 特别是“快车道”土地改革运动 (Fast Track Land Reform Program)^② 的启动, 使得这个国家在此后的近十年中深陷政治局势不稳、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项目编号: 19ZDA29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津巴布韦文学的去殖民书写研究”(项目编号: 23BWW030) 的阶段性成果。

① 沈晓雷:《津巴布韦土地改革与政治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第 130 页。

② 这项运动始于 2000 年 7 月, 计划从大规模商业化的白人农场主处获得土地, 以分配给黑人。改革基本上解决了殖民历史遗留的土地分配严重不公问题, 但出现了多起暴力事件, 还给津巴布韦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挑战, 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

经济急剧衰退、社会动荡不堪的困境。津巴布韦由此步入由兴转衰的历史和文化转型期。转型期的津巴布韦政治生态两极化严重，两大民族——绍纳族（Shona）和恩德贝莱族（Ndebele，以下简称“恩族”）的矛盾更为尖锐。文学是传递民族心声的重要形式。目前，国内尚未出现从文学视角探讨津巴布韦民族矛盾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以这一时期津巴布韦文学（主要为英语文学）为范本，研究津巴布韦文学作品中的民族对立与国家认同问题。

从 21 世纪初津巴布韦英语文坛的总体概况来看，与绍纳族作家相比，恩族作家，无论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布莱恩·奇科瓦瓦（Brian Chikwava）、诺瓦奥莱特·布拉瓦约（NoViolet Bulawayo）和克里斯托弗·姆拉拉兹（Christopher Mlalazi）的几乎所有作品，还是多位文坛新秀创作的短篇，大多聚焦于厌乱主题，以表达对国家衰败、社会失序、生灵涂炭等乱象的厌倦、愤懑。“厌乱”诚然是为了“望治”，以传递对国泰民安、公平正义的向往，但相关作品往往揭露了社会黑暗和人性阴暗面，以表示对由绍纳人执政的津巴布韦政府的强烈不满甚至极度仇恨，并对其极力批判，“望治”成分甚少。此类作品中的国家认同基本阙如，鲜少流露绍纳族作家笔下的国家立场、爱国情怀、责任意识、乐观情绪和希望视域，如《并非新的一天》（*Not Another Day*）、《不确定的希望》（*The Uncertainty of Hope*）、《白色的神，黑色的魔》（*White Gods, Black Demon*）、《跋涉及其他故事》（*The Trek and Other Stories*）、《哈拉雷的发型师》（*The Hairdresser of Harare*）等。两大民族作家在题材选择、主题偏好、叙事基调、审美趣味等方面差异较大，为我们透视转型期津巴布韦紧张的民族关系及其成因提供了典型案例。

一 民族对立的往昔与当下

1884 年的柏林会议无视非洲民族或部落的自然形态，强行将非洲分为若干国家。独立后的非洲各国又缺乏“神经中枢”来统一协调，大多数非洲国家因此“不具备一个国家应有的凝聚力”，^①其中一个主要表现

^① 蒋晖：《从“民族问题”到“后民族问题”——对西方非洲文学研究两个“时代”的分析与批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 年第 6 期，第 122 页。

是民族矛盾尖锐且冲突不断。津巴布韦紧张的民族关系也是导致这个国家凝聚力变弱的要因之一。两大民族——占总人口约85%的绍纳族和约15%的恩族在殖民时期和独立后数度离合,在21世纪尤为对立,是透视这一时期津巴布韦英语文学中民族矛盾尖锐的关键背景。绍纳族主要分布在津巴布韦东北部,是津巴布韦最早的居民,也是非洲文明重要代表大津巴布韦(Great Zimbabwe)的缔造者;恩族主要聚居在西南地区,原为19世纪初迁入津巴布韦境内的祖鲁族(Zulu)的分支,“素以英勇善战著称”,^①曾凭借武力入侵绍纳等周边民族居住的地区。

20世纪中期开始,以民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政党之间有合作,更有分裂。起初的民族主义政党吸纳了各族精英,但权力斗争很快导致内部分裂,继而形成了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绍纳族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简称ZANU,津民盟),以恩族为根基的是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简称ZAPU,津人盟)。二者在1964~1979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为争夺领导权而展开斗争;在反殖民主义的战争中则联手对抗白人政权。1976年成立的“爱国阵线”联合了两大政党,在独立前夕1979年英国外交大臣主持的兰开斯特大厦会议(Lancaster House Conferences)中,为维护黑人利益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两党的蜜月期稍纵即逝,独立后很快就爆发了冲突。1980年独立之初的选举就预示了“即将出现的凶兆”。^②因为津人盟的选票几乎全部来自恩族,而津民盟的选票则大都来自绍纳族。1982~1987年的“古库拉洪迪”(Gukurahundi)行动更是“加剧了民族分歧”。^③津人盟的游击队员对恩族在独立后的政府中分到的权力不满,促使政府实施高压的民族政策,不仅将多名恩族高官清除出军队和政府,还派军队前往恩族聚居地实施镇压,致使两万多人丧生。直到1987年津人盟与津民盟签署联合协议,并宣布合并两党,才为“古库拉洪迪”行动画上句号。但二者间的裂痕并未消除。津巴布韦政府多年来对这一事件始终三缄其口。

21世纪前后,民族矛盾在历史积怨和现实危机催化下更为尖锐。恩族

① 陈玉来:《列国志·津巴布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7~28页。

② E. Sibanda, *The 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1961-87: A Political History of Insurgency in Southern Rhodesia*,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2005, p. 222.

③ CCJPZ/LRF, *Breaking the Silence, Building True Peace: Report on the Disturbances in Matabeleland and the Midlands, 1980-1988*, Harare: CCJPZ and LRF, 1997, p. 5.

对“古库拉洪迪”怀恨在心；由危机引发的经济困难、社会动荡又加剧了他们对津民盟的不满、不信任，甚至仇恨。这从以下两方面可见一斑。首先，1999 年成立的反对党民主改革运动（Move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简称 MDC，民革运）给执政党带来了巨大挑战，让执政党“在独立后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① 民革运并非以恩族为基础，但大多数恩族都是其支持者。政府镇压反对党、查处被疑为反对党及其支持者的恩族的情形时有发生，这在多部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其次是恩族的地方民族主义兴起并逐步泛滥，主要表现为恩族不认可津巴布韦人身份，还将恩族历史从津巴布韦历史中割裂出来，并要求地方分权或独立建国。^② 恩族的国家认同感显然十分微弱。而且，津巴布韦的民族矛盾还与种族矛盾交织。如果说非洲黑人多少都“在非洲意识和西方意识的夹缝中生存”，^③ 那么恩族相比于绍纳族对西方意识的依附更为严重。他们向来与殖民者和西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在殖民政府用心险恶的“分而治之”政策下曾享有更高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至今还常联手白人及西方对抗津民盟。

在近两个世纪的共处中，绍纳族和恩族的关系历经了多次变迁，但对立和冲突仍是主旋律。民族矛盾在 21 世纪新的时代语境下更为激化和凸显，危及津巴布韦国家统一和国家共同体构建。文学作为时代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对民众心声、时代变迁的捕捉往往十分敏锐、精准和深入。21 世纪绍纳族和恩族英语作家迥异的创作倾向、主题偏好、审美情趣就是两大民族对立的重要体现。

二 厌乱主题的重描与淡写

津巴布韦本土学者曾指出，21 世纪津巴布韦的文学作品“如果不能反映人们在深重压力下为生存而挣扎的经历，是不可原谅的”。^④ 关注沉

① 沈晓雷：《津巴布韦土地改革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 128 页。

② 沈晓雷：《恩德贝莱地方民族主义对津巴布韦政治发展的影响》，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 155-158 页。

③ 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7 期，第 136 页。

④ <http://www.africanbookscollective.com/books/short-writings-from-bulawayo-ii>. Accessed 2020 - 01 - 16.

痼积弊，的确是危机时代作家肩负的重要使命。因此，这一时期的津巴布韦英语文学虽然具有题材广泛、主题多元的特点，但着重叙述的是厌乱望治主题，以表达对社会乱象的挾伐、对清平治世的向往。只是大多数的恩族作家都将重心放在了“厌乱”上，鲜少“望治”。他们往往以沉重压抑、哀怨凄婉的叙事基调揭示危机中的社会问题、民众遭遇，展现的是一个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世界。绍纳族作家的创作虽然也不乏厌乱叙事，但没有像恩族作家那样流露出对国家和社会的悲观失望，甚至绝望。

比较两组具有代表性的短篇故事集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两组作品分别是主要由恩族作家创作的《来自布拉瓦约的短篇故事（第二辑）》（*Short Writing from Bulawayo II*）与主要由绍纳族作家创作的《写在此时》（*Writing Now*），恩族作家克里斯托弗·姆拉拉兹的《随生活起舞》（*Dancing with Life*）与绍纳族作家劳伦斯·赫巴（Lawrence Hoba）的《跋涉及其他故事》。《来自布拉瓦约的短篇故事（第二辑）》和《随生活起舞》的出版方是爱玛出版公司（'amaBooks）；《写在此时》和《跋涉及其他故事》则由织工出版社（Weaver Press）出版。爱玛出版公司主要与恩族作家合作，织工出版社则主要出版绍纳族作家的作品。这两家出版机构分别成立于2000年和1998年，是津巴布韦出版本土文学作品且面向全球销售的主要出版社。二者的存在本身就是民族对立的体现，各自出版的作品更能反映出民族对立。这两家出版机构已出版十几部由作家群或两个、单个作家创作的短篇故事集（有的包含诗歌），在文学作品中占据较大比例。而且，几乎所有津巴布韦英语作家都参与了短篇创作。这些短篇是一面面折射津巴布韦历史和当下的多棱镜，其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21世纪以来津巴布韦英语文学的“集体水准”，^①可为我们洞察不同民族作家总体创作倾向的差异提供重要分析范本。

首先，这两家出版机构同期出版的两部短篇故事集——《来自布拉瓦约的短篇故事（第二辑）》和《写在此时》对厌乱主题的关注、对恶乱情绪的渲染就存在明显差异。这两部作品出版时间相近，体例相当，都是近30个（首）短篇故事（诗歌）。在前者的29个作品中，除了白人作家的作品，有近20个都为恩族作家所作，^②绝大多数描写的都是极度

① 朱振武、蓝云春：《津巴布韦英语文学的新拓展与新范式》，《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61页。

② 主要通过作者简介来确定作家的民族身份。下文《写在此时》中的作家身份的确立同样如此。

穷困、非正常死亡、令人压抑的葬礼和毫无出路的现实等。《照片》（“The Photo”）中的少年自幼被父亲抛弃，和小说《北哈拉雷》（*Harare North*）中的叙事者一样，因无法确定家族图腾而备受歧视。他手持儿时与父亲的合影，“无助、恐惧、思想混乱”^①地长途跋涉寻父，却在离父亲咫尺之遥时葬身车轮下。《我要飞离》（“I’ll Fly Away”）中每一座坟墓中都有喁喁泣诉的怨魂，最悲惨的那一个生前因绝望而卧轨自杀，是“一周内第三个”^②以此方式自尽的人。即使是题为《希望》（“Hope”）的诗歌表达的也是“我”的万念俱灰。

这些作品描绘的都是人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撞得鼻青脸肿，甚至生无可恋，是社会某些现实的艺术写照，更是恩族民众对津巴布韦政府“极端失望和愤怒”^③的文学表征。类似消极颓废、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恩族作家笔下蔓延。织工出版社出版的《写在此时》中的 28 个故事中，共有 5 个是恩族作家的作品，其中的 4 个故事都明显对危机中的津巴布韦进行负面刻画：那里的贪腐官员自顾享乐，民众却极度困苦。

与之对照，《写在此时》中近 20 位绍纳族作家的视野更开阔，主题也更多元；即使是批判社会问题，也鲜少流露恩族作家笔下那样的悲观情绪或绝望气息。他们有的写底层民众苦中作乐；有的探讨两性关系；有的讲述主人公为年少犯错深感悔恨；有的聚焦人物对亲情和爱情的维系；还有的写肩负家族众望的人物在英国堕落。与同为绍纳族作家的佩蒂纳·加帕（Petina Gappah）和丹尼尔·曼迪绍纳（Daniel Mandishona）的创作相似，这些故事都以比恩族作家更宏大的视野描写人物在世界各地的经历，展现了更为丰富的社会景象。《写在此时》中的《齐祖瓦》（“Chizuva”）还展现了女主角的知足感恩。她应对苦难的法宝是：以乐观的方式让痛苦记忆“散发神秘光芒，然后你会发现你自己开始歌唱”。^④这样的乐观精神和生存智慧在恩族作家笔下是难觅踪迹的。而且，绍纳

① Mathew Chokuwenga, “The Photo”, in Jane Morris, ed., *Short Writings from Bulawayo II*, Bulawayo: 'amaBooks, 2005, p. 40.

② Farai Mpopu, “I’ll Fly Away”, in Jane Morris, ed., *Short Writings from Bulawayo II*, Bulawayo: 'amaBooks, 2005, p. 99.

③ Neil Lazarus, *Resistance in Postcolonial African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ix.

④ Charles Mungoshi, “Chizuvu”, in Irene Staunton, ed., *Writing Now*, Harare: Weaver Press, 2005, p. 219.

族作家即使批判现实,也不会展示无边黑暗、深深绝望。《跋涉》(“The Trek”)中隐含作者“讽刺的模糊态度”^①暗含了对土改失序现象的挞伐,但叙事基调较为明快,结尾也充满希望。《依靠承诺和赊账为生》(“Living on Promises and Credit”)揭示了管理者的贪腐、懒政,但也写了“我”对学生关爱有加。

其次,比较由单一作家写成的《随生活起舞》和《跋涉及其他故事》亦可见,恩族作家的文本世界远比绍纳族的更为压抑、沉重和黑暗。这两部作品都广受好评,体量均为10个短篇,且主题相对集中,两位作者都是新生代作家代表。《随生活起舞》的作者姆拉拉兹更具国际影响力,他的这部小说聚焦“古库拉洪迪”行动,契合了西方将“不听话”的津巴布韦政府“妖魔化”^②的需求,特别是在津巴布韦2003年退出英联邦,终结了与英国的密切关系后。而且,姆拉拉兹旅居欧洲、在西方资助下写作,对西方读者更为了解和迎合,更可能着力渲染津巴布韦的阴暗面,因为这才是他们眼中描述非西方世界的“最好表达”。^③

《随生活起舞》中有7个故事都是此类故事。它们都截取了某个阴暗面来表达对津巴布韦政府的失望。《折断的翅膀》(“Broken Wings”)中的小女孩为协助年迈的外公照顾病重的外婆和妈妈而辍学,还被发放救济粮的“咬人的蛇”^④奸污。《推土机要来了》(“The Bulldozers Are Coming”)写了实施强拆的警察故意绊倒孕妇。^⑤《惊叹!》(“Eeish!”)中的青年被穷苦和无望困住,讽刺政府军队只顾射杀不结盟的人。无论是将政府工作人员塑造成强奸犯,还是将军、警察刻画成暴徒,表达的都是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和不少恩族作家相似,姆拉拉兹夸张地批判政府,揭露阴暗面,却并未流露多少真挚情感,更遑论探寻出路。这背后的创作动机到底是忧国忧民,还是丑化母国以迎合西方?后者的可能性

① Oliver Nyambi, “The Flip Side: Re-Visioning Zimbabwe’s Third Chimurenga Land Discourse in Lawrence Hoba’s Short Stories”,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2017, 48 (2), p. 25.

② 王文、张瀚筠:《不满被西方媒体妖魔化,期待靠改革实现大逆转——走进“后穆加贝时代”的津巴布韦》,《环球时报》2019年10月15日,第7版。

③ 林丰民等:《东方艺术创作的他者化倾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37页。

④ Christopher Mlalazi, “Broken Wings”, in *Dancing with Life*, Bulawayo: ’amaBooks, 2008, p. 8.

⑤ Christopher Mlalazi, “The Bulldozers Are Coming”, in *Dancing with Life*, Bulawayo: ’amaBooks, 2008, p. 70.

应该更大。

《跋涉及其他故事》的故事主题、渲染的情绪则完全不同。这部作品在揭示问题的同时还传递了乐观情绪、展现了希望。《跋涉及其他故事》中的 10 个故事既有对殖民历史的控诉，也有对农村人被城市吞噬的哀叹，还有对宗教的嘲讽等，但主要写的是土地分配后黑人新农场主的遭遇。在津巴布韦官方话语中，“快车道”土地改革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战争”，旨在消除“残余的殖民主义影响”。^①《跋涉及其他故事》则直面土改中的问题，具有反主流文化特征。获得土地的黑人因缺乏技术、资金等，梦想中的美好未来在现实面前摔得粉碎，但他们的农场世界不乏活力、信心、希望、正义和宽容，彰显了好的文学能让人们挖掘生命生机的伦理和审美功效。在多个故事中出现的玛丽亚（Maria）来自城市。当农场里的许多人知难而退时，她选择“继续雇用工人”^②耕种土地。她美丽自信、自尊自重，不仅学会了耕作土地，还是许多男性的倾慕对象。在一众追随者中，玛丽亚选择了志同道合的马丁（Martin）。马丁原本庸庸碌碌，后来成了一名兢兢业业的农业技术推广员。玛丽亚是在他完成蜕变后才接受他的爱情。她还给农场带来了音乐、舞蹈和欢乐，让农场充满活力和希望。《追随我心》（“Having My Way”）中还描写了与她有关的一次庭审。这次庭审目的是伸张正义，惩罚恶人，但玛丽亚最终原谅了过错方。《追随我心》这个短篇描写农场以传统方式快速审理案件，暗讽的是土改中司法系统的无力和低效。2000 年，“快车道”土地改革运动在官方支持下加速推进，高等法院收到了白人农场主的大量上诉。为维护津巴布韦自身利益，高等法院命令政府和警察将占地者赶走，但遭总统反对。^③虽然如此，作者赫巴却从民间司法中找到了伸张正义的途径，既肯定了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还传递了正义不会缺席的信念。

厌乱主题在 21 世纪津巴布韦文坛较为普遍，但恩族作家和绍纳族作家的相关叙事存在明显差异。恩族作家着重描写厌乱主题，呈现的是一个暮气沉沉、暗无天日的文学世界，渲染的是一种心灰意冷、万念俱灰的悲观情绪，凸显了恩族对津民盟执政的失望和批判。绍纳族作家作品的题材和主题则更加丰富多元，对社会乱象的批判也更为克制和理性，由此展

① Irکیدzayi Manase, “Lawrence Hoba’s Depiciton of the Post – 2000 Zimbabwean Land Invasions in *The Trek and Other Stories*”, *Tydskrif Vir Letterkunde*, 2014, 51 (1), p. 6.

② Lawrence Hoba, *The Trek and Other Stories*, Harare: Weaver Press, 2009, p. 7.

③ 沈晓雷：《津巴布韦土地改革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 142 ~ 143 页。

现出生存智慧、乐观情怀等,在不回避问题的同时描绘了更丰富的国家形象,传递了人们对国家走出危机的信心和希冀。两大民族作家创作、审美倾向的不同既是转型期社会危机催化的尖锐的民族矛盾在文学领域的体现,也是恩族地方民族主义“已发展出相对完善的思想意识形态”^①的说明;是意识形态作用于文学的结果,也是文学参与“意识形态的塑造”^②的佐证。两大民族英语文学中国家认同的显著差异更是如此。

三 国家认同的稀缺与彰显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指出,在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中,文学等文化产物常被用来展示爱国之情,甚至是“深刻的自我牺牲之爱”,^③有助于共同体成员确立、悦纳其国家身份,并对国家政治、文化、族群等产生积极情感和正面评价。这对于非洲各国提升凝聚力甚为关键,对于转型期种族、民族矛盾激化的津巴布韦尤其如此。然而,除了伊旺·维拉(Yvonne Vera)的著名小说《石女》(*The Stone Virgins*),21世纪恩族英语作家的绝大多数作品展现的不是对国家的爱和认同,而是厌倦和怨恨,甚至是绝望。

蒋晖曾指出,非洲国家的黑人文学整体上与官方意识形态对立。^④21世纪恩族英语作家的创作特别明显。他们的重要使命似乎就是控诉津巴布韦政府对恩族的漠视和敌视,或借写国内外津巴布韦人的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来凸显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极力批判。《那座蚁山》(“The Ant-hills”)中恩族居住地的道路自津人盟原首领乔书亚·恩科莫(Joshua Nkomo)过世后就“死了”,^⑤是深感被边缘化的恩族对其生存境遇被漠视

① 沈晓雷:《恩德贝莱地方民族主义对津巴布韦政治发展的影响》,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155页。

② 陈榕:《新历史主义》,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第670页。

③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叻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136页。

④ 蒋晖:《从“民族问题”到“后民族问题”——对西方非洲文学研究两个“时代”的分析与批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6期,第124页。

⑤ Gertrude Nyakutse, “The Anthill”, in Jane Morris, ed., *Short Writings from Bulawayo II*, Bulawayo: amaBooks, 2005, p. 108.

的指控。《即将来临》（“The Coming”）、《他们来了》（“They Are Coming”）等嘲讽的则是政府对被贴上“反对党”“叛徒”等标签的恩族的监控和殴打。《和母亲一起逃跑》更是将诛伐的矛头直指独立之初政府军队对恩族的镇压。

这在布拉瓦约的《快照》（“Snapshots”）和奇科瓦瓦的《北哈拉雷》中最为鲜明。布拉瓦约是首位入选布克奖终选名单的非洲女作家。2013年，她就凭借首部小说《我们需要新名字》（*We Need New Names*）获此殊荣；2022年，又以小说《荣光》（*Glory*）跻身布克奖终选名单，而且在入选的六位作家中最为年轻。聚焦非洲暗黑面是她创作的一大特征。她的短篇故事《快照》就描写了一个惨绝人寰、耸人听闻的至暗世界。主人公的父亲住院期间因医院停电身亡；母亲因传统陋习被迫改嫁；哥哥因贫困辍学后前往南非，不久即被一群仇恨他“占用了其国家资源”^①的当地青年杀害；姐姐为躲避叔叔的魔掌逃往南非后音讯全无；年仅14岁的主人公孤苦伶仃，沦为某位中年男子的情人后死于流产。这家人无一幸免地惨遭噩运，极为夸张的情节似乎要将民众的凄苦凝缩其中，让读者不见一丝微光，其文学想象、艺术构思的确巧妙。文学创作往往需要依傍某个“现实印象”，并在创作目标的指引下做出“一系列的联想和选择”。^②《快照》中的连环悲剧无疑是作家出于特定的创作意图，在某些阴暗面的刺激下经过联想和选择加工而来。那些事件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即使布拉瓦约多年久居美国无法亲见，也可能有所耳闻。但她将一系列悲惨事件以令人震撼的方式集中到主人公一家身上，自然是要竭力凸显津民盟领导下的社会吞噬了主人公一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快照》以多连拍的方式勾勒人物遭遇，折射的是万千津巴布韦民众的不幸。《北哈拉雷》的创作动机相似。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获得由西方设立的凯恩非洲文学奖的首位津巴布韦作家，极力挾伐津巴布韦政府向来也是其创作的主要动机。《北哈拉雷》的主人公是一名原本忠诚于津巴布韦政府的青年民兵，因被贪腐的上司欺骗逃往伦敦，得知真相后精神分裂，最终迷失在了伦敦街头，感觉“像村里的流浪狗”，只有等到“被人用石头砸中头部致死后方能解脱”。^③这部作品以展示人性弱点、社会暗黑的

① NoViolet Bulawayo, “Snapshots”, in Jane Morris, ed., *Where to Now*, Cardigan: Parthian Books, 2012, p. 65.

② 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149页。

③ Brian Chikwava, *Harare North*, London: Vintage Books, 2010, p. 226.

方式展现了恩族作家心目中的津巴布韦，同样体现了津巴布韦的暗黑无边、津巴布韦人的穷途末路。

21世纪的恩族作家对津巴布韦政府及其领导下的社会极尽挞伐、丑化之能事。相关书写是危机中的津巴布韦某些侧面的特写，可能是作家因国家犯错而深感羞耻，因而恨铁不成钢地大加指摘，这同样表达了他们的爱国之情。就像福克纳刻画恶劣的美国人是因为想通过“羞辱”他们来鞭策他们改进。但他在揭示美国国民劣根性的同时还写了他们的“勇敢、自我牺牲与理性的一面”。^①恩族作家却只写了极少数人物的勇敢和无私，绝大多数人物都难见人性微光。恩族对津民盟执政的国家的全然批判、决绝排斥昭然若揭，对津巴布韦政府和国家普遍怀有的“偏见乃至仇视心态”^②也洞若观火，对国家认同思想和情感的传递则基本阙如。

同期绍纳族英语作家笔下的国家认同就要显著得多。这在当属民族主义文学范畴的《归家》(*Coming Home*)、《奇木兰加章程》(*The Chimurenga Protocol*)、《疯得正好》(*A Fine Madness*)等作品中自不待言。此外，从《并非新的一天》《白色的神，黑色的魔》《跋涉及其他故事》《哈拉雷的发型师》等多部呈现多种观点的作品中亦可见，绍纳族作家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直视当下，无论是挞伐精英还是揭示社会的黑暗，无论是怜悯国内民众贫困交加还是同情国外同胞穷困潦倒，其中的国家认同都较为明显。

首先，有多部作品从津巴布韦主人翁的立场出发，对暴力政治、官员贪腐等做出了反思和挞伐，但同时也从正面描写政府。《白色的神，黑色的魔》中的短篇《烟与灰》(“Smoke and Ashes”)中的男主角是一名忠诚的执政党党员，他直面千疮百孔的现实力求公允、全面地分析问题。题名中的“烟与灰”隐喻的是他对儿时好友维纳斯(Venus)纯真无瑕的往昔、津巴布韦繁荣兴旺的昨日都已如“烟”如“灰”般消逝的哀叹和惋惜。他对现实有更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他看来，政治家应凭“人们喜欢而不是怕你”^③赢得选票。这是津民盟应有的自我批评，暗含了对

① 李文俊：《“他们在苦熬”——关于〈我弥留之际〉》，《世界文学》1988年第5期，第188页。

② 沈晓雷：《恩德贝莱地方民族主义对津巴布韦政治发展的影响》，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158页。

③ Daniel Mandishona, “Smoke and Ashes”, in *White Gods, Black Demons*, Harare: Weaver Press, 2009, p. 20.

2008 年总统选举中的政治暴力的批评。“快车道”土地改革中的政治暴力化后，暴力在议会和选举中变得广泛、系统，是执政党“谋求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①津巴布韦因此也被部分媒体称为集权国家或“警察国家”。^②2008 年的总统选举就笼罩在暴力阴影之下。《烟与灰》的叙事者显然对此持否定态度。绍纳族作家的多个作品也批判了执政党的不当行为。《卡菲尔玉米》（“Kaffir Corn”）和《第二次跋涉》（“The Second Trek”）均对有人在土改中不劳而获的行为提出了疑问，讽刺秩序混乱的土改。《肮脏的游戏》（“A Dirty Game”）中自私、虚伪的官员，《哈拉雷的发型师》中贪婪、跋扈的部长等，也是绍纳族作家基于国家立场痛批贪腐官员、渴求政治清明的体现。与此同时，虽有大量作品强调 2008 年总统选举的不公，《烟与灰》却展现了另一面——许多关于反对党即将获胜的消息只是“谣传”。^③而且，虽然不少作家，特别是恩族和白人作家常写政府一手遮天导致法治名存实亡，《烟与灰》却写道：某位部长落选后因为怒杀了嘲笑他的投票站站长，立马被逮捕；某位执政 28 年的副总统落选后也不得不离开权力宝座。这就说明，位再高权再重的官员也不能为所欲为。这就像津巴布韦知名白人作家布莱昂尼·希姆（Bryony Rheam）的《这个九月的太阳》（*This September Sun*）中的警察形象那样难能可贵。这些警察不像许多作品中的警察那样无能、低效，而是高效且富有责任心。《哈拉雷的发型师》还刻画了象征威权和正义的总统夫人，旨在说明政府职能并未失效，社会正义并未缺席。从正面刻画的政治生态体现的是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可和信心。

其次，绍纳族作家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还展露了强烈的责任意识 and 真切的爱国情怀。当《烟与灰》中刚从美国回来的维纳斯采取西方视角，以自由、人权为由攻击津巴布韦时，“我”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她被西方媒体洗脑了。因为津巴布韦有反对党，还有活跃的独立媒体，“比美国喜欢的许多非洲国家都更自由”。^④事实的确如此。津巴布韦研究专家史蒂芬·陈（Stephen Chan）就指出，津巴布韦的独立媒体和反对党向来享有

① 沈晓雷：《津巴布韦土地改革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 176 页。

② Elton Mangoma, “Living in a Police State”, *The Zimbabwe Independent*, October 12, 2012.

③ Daniel Mandishona, “Smoke and Ashes”, in *White Gods, Black Demons*, Harare: Weaver Press, 2009, p. 18.

④ Daniel Mandishona, “Smoke and Ashes”, in *White Gods, Black Demons*, Harare: Weaver Press, 2009, p. 12.

言论自由,最典型的例子是前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妻子是他们“间接攻击穆加贝的目标”。^① 织工出版社出版的表达反政府观点的作品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② 旅居欧美的白人作家写的“可能会冒犯人的书”^③ 也自由流通。关于人权,《烟与灰》的叙事者认为这也并非西方制裁津巴布韦的原因,西方敌视津巴布韦是因为黑人拿回土地危及了白人及英国和美国的利益。这的确是根本原因。乌干达2001年和2006年的总统选举也伴随暴力,但2007年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还是如期在其首都举行。^④ 西方的“双重标准”和“欧洲中心”立场足见一斑。“我”对西方关于津巴布韦的偏见进行逐一反驳,凸显的是本土立场、国家意识和国民情怀。叙事者的责任心、担当意识和爱国信念,更表现为对津巴布韦的不离不弃。他深爱他的祖国,对其未来也有信心,因此婉拒了维纳斯帮忙移民美国的建议。他决心留下来“应对那些坑坑洼洼的道路、漫长的队伍、权力引发的暴行、频繁的停水,还有那一长串的零”。^⑤ 在绍纳族作家的其他作品中也可以看出类似的爱国信念与对国家的信心。《不确定的希望》中的官二代在艰苦条件下并没有抛弃祖国远走高飞,而是选择坚守岗位;《明天并非全新的一天》(“Tomorrow Is Not Another Day”,2006)中的社工们虽然难以正常开展救助,但他们护佑弱者的爱心、责任心和正义感始终在场;《哈拉雷的发型师》中嚣张跋扈的M_部长之外还有德高望重的M_先生制止她恣意妄为;《跋涉及其他故事》中新农场主玛丽亚和农业技术推广员马丁的美好爱情既体现了农场的勃勃生机,也预示了农场的美好未来。这些绍纳族作家笔下流露的对国家及其民众的热爱与呵护、责任与担当、信心与希冀,在恩族作家作品中几乎绝迹。

① Stephen Chan, *Mugabe, a Life of Power and Violence*, London: I. B. Tauris, 2019, p. 100.

② Annelie Kloth, “You Need to Have the Idea, the Vision, and the Passion—An Interview with Irene Staunton”, in Mbongeni Z. Malaba and Geoffrey V. Davis, eds., *Zimbabwean Transitions: Essays on Zimbabwe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Ndebele and Shona*, New York: Editions Rodopi, 2007, p. 217.

③ Ranka Primorac, “Rhodesians Never Die? The Zimbabwean Crises and the Revival of Rhodesian Discourse”, in Joann McGregor and Ranka Primorac, eds., *Zimbabwe's New Diaspora: Displacement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urvival*,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0, p. 209.

④ 沈晓雷:《津巴布韦土地改革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205页。

⑤ Daniel Mandishona, “Smoke and Ashes”, in *White Gods, Black Demons*, Harare: Weaver Press, 2009, p. 25.

在 21 世纪的津巴布韦英语文坛，恩族作家与绍纳族作家的总体创作倾向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国家衰退的原因极为复杂，但恩族作家基于地方民族主义立场，强调的是执政党的罪不可赦，还在西方意识主导下仇视、丑化与西方关系恶化的津民盟。两大民族作家创作倾向的差异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在文学世界的投射。这样的民族对立在非洲较为普遍。尼日利亚独立后不久即爆发的内战、索马里持续至今的武装冲突、1994 年的卢旺达惨案等都与民族矛盾关联密切。文学作品是记录、传递民族心声的重要方式。挖掘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干预现实的功能，对于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大有裨益。后穆加贝时代的津巴布韦政府正视了恩族人对政府和国家的不满与疏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弥合民族裂痕，以铸牢国家共同体意识，但暂且成效不大。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繁荣的多民族国家，在促进民族文学发展等民族政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团结经验，可为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改善民族关系提供借鉴，不啻为中非文化交流、中非文明互鉴的良好路径。

【责任编辑】王严

Act on General Commercial Law

From Siti to Kidude: A Socio-historical Study of Taarab Music
in Zanzibar

Ao Manyun, Yan Ziyi / 113

Abstract: Taarab is a music genre shaped by multi-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hanges on the coastal region of East Africa. It was originally regarded as court music in the Sultanate of Zanzibar, and later evolved into popular music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During this process, two female musicians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Siti Binti Saad, known as “The Mother of Taarab” and Kidude Binti Baraka, known as “The Queen of Taarab”,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arab. With the specific social contexts concomitant with their musical endeavors, Taarab accomplished its localization in Zanzibar and manifested its legacy and innovation in terms of form and content. Arguably, Siti endowed Taarab music with connotation of survival and resistance, later on this basis, Kidude cooperated with Tanzanian government as well as a female orchestra to inherit and innovate traditional Taarab,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arab and maintained the subjectivity of female musicians in a Muslim society. We argue that the study of Siti and Kidude especially their individual features,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socio-historical study of Taarab music in Zanzibar.

Keywords: Taarab; Socio-historical Study; Female Musicians; Zanzibar

The Ethic Tens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Zimbabwean Literatur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Lan Yunchun / 130

Abstract: African countries generally confront the problems of domestic ethnic opposition and weak national identity, and literary works are important vehicles for recording and conveying the sentiment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literary works in English by writers from Ndebele and Shona, the two main ethnic groups in Zimbabw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 terms of their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 thematic preference, narrative tone and aesthetic taste,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identity between the two ethnic groups of writers, as well as the focus and expression of ethnic opposition between them.

Keywords: English Literature in Zimbabwe; The Themes of the Weariness of Disorders; Ethnic Tension;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Perspective: An Analysis on History Textbooks of Secondary Schools in Anglophone Cameroon

Zhang Shengyun / 144

Abstract: Most African countries are diverse in ethnic groups, cultures, and religions. With a complex colonial history, it is facing more difficulties for African countries to 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ty. History textbooks play a key role in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which can help cultivate the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for the young generation. It is of a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national rejuvenation. History Textbooks of Secondary Schools in Anglophone Cameroon fail to achieve one national identity between “self image” and “nation image”, which causes multiple competition and a blur of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long existing “Anglophone crisis”, Cameroon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function of history textbooks on national identity. History textbooks should emphasize the history of Anglophone and Francophone Cameroon fighting against colonizers and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former suzerain. History textbooks should be used to solve the issues of separation and mutual hate and to promote the idea of “one Cameroon”.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History Textbooks; Cameroon